

鋒芒暗藏，思想浮現，政治潛伏

● 徐 昕



章賀皆為當下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，皆為「敏感人士」。兩人合作，四手聯彈，怎不引發讀者共鳴？文如其人。其人有鋒芒，有思想，有政治，其書如何可能「無政治，無思想，無鋒芒」？

章詒和、賀衛方：《四手聯彈》
(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10)。

《四手聯彈》(以下如無特別註明，均指香港版，引用只註頁碼)被譽為「知識界最出人意料的合作」(參見《讀藥周刊》，第1期，鳳凰網讀書，<http://book.ifeng.com/shupingzhoukan/duyao01>)。章詒和、賀衛方先生是筆者敬重的學人，香港浸會大學陳峰教授又特意為筆者帶來了香港的完整版，不說上幾句，實在過意不去。

章詒和，中國「頭號大右派」章伯鈞之女，一位閱盡天下炎涼、歷經世道滄桑、作品屢經興禁、備受國人矚目的人文學者。賀衛方，中國最具社會影響的法律學者之一。於筆者而言，賀先生亦師亦友。兩人皆為當下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，皆為「敏感人士」，皆有傳奇經歷或別樣人生，卻波瀾不驚，且相互理解，彼此鼓勵。章賀合作，四手聯彈，怎不引發讀者共鳴？文如其人。其人有鋒芒，有思想，有政治，其書如何可能「無政治，無思想，無鋒芒」(〈自序一〉，頁x)？因此，章詒和在自序中聲稱「無政治，無思想，無鋒芒」，多少有些「此地無銀」的意味。實際上，讀者最希望的，或許就是從無政治中讀出政治，從無思想中感受思想，從無鋒芒中體會鋒芒。

人天生有一種逆反心理，你說東來偏向西，愈說沒有，愈想找到蛛絲馬迹。人也有一種偷窺心理，愈是禁書，就愈想看看。此書內地版(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)比香港版少了五篇文章——〈歷史是有聲音的〉、〈先天稟賦，後天學養〉、〈銜石成痴絕，滄波萬里愁〉、〈遂了功名遂風情〉和〈錢鍾

書之「閱世」，筆者一拿到香港版便先讀這幾篇，果然從章賀聯彈的琴音之中發現了政治、思想和鋒芒，心中竊喜，相信許多讀者也一樣。

例如，在〈歷史是有聲音的〉一篇中，章寫道，「父母幾次政治流亡，都落腳在香港」（頁147），「歷史是有聲音的，這聲音並不來自喋喋不休的會議或日夜喧囂的電視」，還提到吳法憲的回憶錄、何方的自述《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》、楊繼繩的《墓碑：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》等中國大陸禁書（頁149）。

在〈先天稟賦，後天學養〉一文中，章提到翦伯贊在「政治需要和學術良心之間的矛盾」，「翦伯贊是主張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，但他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級地伺候於政治；翦伯贊是主張學術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、立場，但他不能容忍學術如此卑賤地跪拜於權力」（頁197）。她說到吳晗，「他以學術起家，未以學術為業；他成於政治，又死於政治」（頁198）。

〈銜石成痴絕，滄波萬里愁〉在某種意義上是為汪精衛正名。〈遂了功名遂風情〉所寫的是關於「頭號大右派」、至今仍未平反的羅隆基。

在〈錢鍾書之「閱世」〉中，賀提到錢鍾書的「反動材料」。例如，解放前與美國間諜李克（W. Allyn Rickett）、特務沈學泉關係密切；曾見過「蔣匪」並為之翻譯《中國之命運》；在上海美國俱樂部演講一次。解放後，錢一貫散布反蘇反共和誣衊毛主席的反動言論，說《毛選》文字不通，是骯髒的東西；說「共產黨和蘇聯一夥，國民黨和美國一

夥，一個樣子沒有區別」（頁294）；說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鄉下餓死好多人，比日本人在時還不如」（頁294-95），說「胡風問題是宗派主義問題，他與周揚有矛盾，最後把胡風搞下去了」（頁295）。這些材料在中國大陸被視為「成人不宜」，而為絕大多數人所無法接近。

此書內地版不僅整篇地砍，而且逐字逐句地審查。網友「見色起義」在〈一國兩版，情何以堪〉的網文中不完全地列舉了內地版的二十六處刪改，一些刪改甚至曲解了原意。例如，賀在〈一生負氣成今日，四海無人對夕陽〉一文中寫道：「陳公晚年，遭遇浩劫，工資停發，存款凍結，他所住的中大寓所——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，四周架上高音喇叭，晝夜不休歇，輪番廣播批判他的文章。後全家被趕到四面透風的平房，直到折磨致死。臨終前，他的眼角不斷流淚，沒有留下隻言片語。」（頁239）但內地版刪改為：「陳公晚年，遭遇浩劫，工資停發，存款凍結，他所住的中大寓所——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。臨終前，他的眼角不斷流淚，沒有留下隻言片語。」（內地版，頁227，參見見色起義：〈一國兩版，情何以堪〉，<http://ishare.iask.sina.com.cn/f/8504609.html>。）讀者不僅看不到陳寅恪晚年遭受的非人折磨，甚至可能誤解為他因「工資停發，存款凍結」而在臨終前流淚。這不由令人想起奧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在《一九八四》（*Nineteen Eighty-Four*）中的警示：「誰控制了過去，誰就控制了未來；誰控制了現在，誰就控制了過去。」（奧威爾著，董樂山

此書內地版不僅整篇地砍，而且逐字逐句地審查，一些刪改甚至曲解了原意。雖經出版審查的洗禮，但內地版的某些章節仍鋒芒暗藏，思想浮現，政治潛伏。

章賀並不世俗，卻要定位於世俗，關心政治，卻要聲稱「無政治」，他們的無奈和悲涼在文中隨處可見。不過，本書寫作稍為隨意，主題有所分散，借景抒懷的情緒尚有不圓滿。

譯：《一九八四》〔上海：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06〕，頁225。）

雖經出版審查的洗禮，但內地版的某些章節仍鋒芒暗藏，思想浮現，政治潛伏。稍舉一例，賀透過《格列佛遊記》(*Gulliver's Travels*)中的黨爭，指出「任何政黨都要承認它不是神聖的，不是所有真理的壟斷者」(內地版，頁168-69)。若作深入解讀或者聯想，此話幾乎可作為叛逆的「罪證」。賀在答記者問時一語道破天機：我們這裏的「無政治」更多的是說不用激烈的話語討論政治問題，也不直接論述狹義的政治，但不是完全的「政治無涉」(賀衛方：〈不能簡單以「感性」與「理性」區分章詒和與我〉〔2010年4月30日〕，鳳凰網讀書，http://book.ifeng.com/shupingzhoukan/duyaoshuping/detail_2010_04/30/1475743_0.shtml)。

在一個政治泛化的社會中，何處有無涉政治的風景？正如政治就是一切，一切亦可轉化為政治，這便是當下中國政治泛化的現實。而且，這種轉化不可預測，由此導致「被政治」的不確定性。聯想到西南政法大學老校區搬遷事件中筆者「被政治」的際遇，加上最近數月重慶陰雨連綿，霧鎖山城，禁不住感慨萬千。泛化的政治與時俱進，手段上不斷推陳出新，全面深入，「隨風潛入夜，操控細無聲」。推至極端，生活於政治，政治即生活。不論西南東北，不論在朝在野，政治都無時不有，無處不在，無事不涉，更是無人不懼。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，古老的中華大地何時能有「風能進，雨能進，國王不能進」的小磨坊？你我都深深地嵌入這個政治的世界。

現在讓我們從讀者的角度轉換成作者的視角。四手聯彈，章賀期望演奏出何種樂章，在觀眾中激起何種漣漪呢？其實，他們一早便知，四手聯彈本身即為一個出人意料的創意，或曰行為藝術，僅此就可以緊緊吸引讀者。進而，他們嫺熟地把握了讀者的逆反和偷窺心理。章說，「世俗，趣味，隨意，是我們的宗旨」(〈自序一〉，頁x)，但這是外在，他們知道，觀眾自然會鑼鼓聽聲，聽話聽音，會透過文字和攝影的表象，去把握隨意之中的用意，趣味之餘的深思，世俗之外的精神。章賀並不世俗，卻要定位於世俗，關心政治，卻要聲稱「無政治」，他們的無奈和悲涼在文中隨處可見。此景此情，幾為共識；令人惆悵，引人共鳴；曲為銘志，言乃心聲；高山流水，知音遍地；四手聯彈，匯成交響。

不過，相對於讀者的高期待，章賀二人多少也有些辜負。本書寫作稍為隨意，主題有所分散，賀衛方的攝影技術有待提升，章詒和推崇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所說「明確、精密和簡潔的文風」(頁85)，但二人還是推敲得不夠，借景抒懷的情緒尚有不圓滿。說是「聯彈」，但43個主題中，僅有10個是兩人合奏，其餘皆為自彈自唱。章賀聯彈的默契感也不足，確實是「你向東來我向西」(〈自序一〉，頁x)，甚至還稍顯出一些不夠相配，章的文字老道，風格率真，而賀跟在後面顯得有些勉強，偶爾還有些「為賦新詞」之感。其緣由大概是成書時間稍快，有些為合奏而合奏、為寫而寫的急就之感。也難怪，四手聯彈的創意獨特，他

們或許有些着急，生怕被別人搶了頭籌，加上商業運作的出版社一周一小催，一月一大催，兩人日夜兼程，遂生倉促。

儘管如此，章賀四手聯彈仍不失為一段書林佳話。即使兩人謹慎地給自己貼上接近於噱頭的醒目標籤：「無政治，無思想，無鋒芒」，我們也會聯想起傳統文人的春秋筆法，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」。或許，這既是一種無奈，也是一種策略，既是章詒和的書被一禁再禁、屢受打壓後不得已而為之，也是賀衛方被「發配邊疆」後，處江湖之遠仍不失本色、憂國憂民的真實寫

照。知識份子作為民族的脊樑，一代代薪火相傳，筆為劍，字為槍，實踐着「書生報國無他物、唯有手中筆如刀」的古訓。章賀二人，既道破世道人心，亦針砭國體政制；既靜觀歷史鉅變，亦展望社會轉型，堪稱當代獨立學人之楷模。正可謂：

章賀攜手，知音共賞；
借古言今，飽含滄桑；
鉤沉歷史，追尋真相；
靜水流深，鋒芒暗藏；
對酒當歌，大漠風光；
人文樂章，邊塞絕唱。

從規制國家到規制資本主義

● 盧 超



John Braithwaite, *Regulatory Capitalism: How It Works, Ideas for Making It Work Better* (Cheltenham, UK; Northampton, MA: Edward Elgar Publishing, 2008).

澳洲國立大學法學院教授布雷斯維特 (John Braithwaite) 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。他不僅是一位全球知名的犯罪學家，獲得過2006年的斯德哥爾摩犯罪學獎 (Stockholm Prize in Criminology)，而且還在規制理論、司法制度、共和主義、知識產

在布雷斯維特看來，所謂「規制資本主義」並非新自由主義。在規制資本主義時代下，影響公民和社會生活的治理模式是合作治理而非原來的國家治理，而合作與規制之間的互惠關係催生出更多形式的治理模式。